



幽暗的闪电

□张怡微

之前的专栏里,我们讨论过美国作家安妮·普鲁的《船讯》,她更有名的代表作《断背山》,则收入在《近距离:怀俄明故事》中。好的作家,总是能为她笔下的地方以文学的名义命名。我从来没有去过美国,但我想到怀俄明,就会想到安妮·普鲁的讲述,想到那个彪悍、淳朴、广袤的山区,羚羊与牛群及其千奇百怪的子民。

《近距离》开篇作品《半剥皮的阉牛》堪称文学写作的经典范本,以嵌套结构处理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暴力对峙。故事的发生地,是在怀俄明首府夏延,主人公梅罗于1936年只身离乡,度过了将近60年,终于有一次不得不回家的契机,来自于弟弟被农场的食火鸟抓死并吃了。这个人生结局太过突兀,作为小说明线铺陈,高龄的主人公的公路返乡之旅遭遇恶劣天气十分坎坷,他的内心环境也颇为激荡。回顾童年,他想到了童年时代的自己,与弟弟、父亲、父亲的女友之间的往事。他和弟弟曾经听那个女人说过一个阉牛的故事,每年冬天,有位绰号“锡头人”的男子总要宰杀一头阉牛池,这一次他将牛剥皮至一半时,半途而废去睡了一觉,回来发现牛不见了。他到处寻找,发现了西方远远的山边,一头皮开肉绽的活物愤怒地瞪着他,他知道这头牛是来报仇的。很难说梅罗离开农场再不回去,是因为这个可怕的故事,还是因为避开父子三人与父亲女友之间潜在的情欲关系。他的弟弟罗洛,则以另一种方式背叛了土地,他把农场卖给了澳大利亚人经营动物园。小说的结尾,设计为梅罗与暴风雪的抵抗,他在逆风中看到了那头剥皮至一半的阉牛,“以一只红色独眼守候着他”,仿佛命定的诅咒。安妮·普鲁的生态观跃然纸上,她和古典的作家一样并不喜欢人类中心主义和现代文明。年逾古稀的主人公拒绝坐飞机,一定要在风雪中驾车回乡,即是日常生活中建构内心秩序的表征。

“阉割”动物是安妮·普鲁直面暴力的母题。《脚下泥巴》同样写的是阉牛故事,叙述中却镶嵌着人类驯牛所经历的风险与伤害,更重要是互动中人被唤醒的那种原始欲望。被唤醒“饥饿感”的戴蒙德,不喜欢上大学,而想参加牛仔竞技,不失为和《半剥皮的阉牛》中梅罗抵触飞机一样的内心取向:“他一坐上牛背,内心立刻闪起幽暗的闪电,感受到光荣实在的自我”。所以,“饥饿感”到底是什么呢?小说文本的暗示,离不开牛仔与男性气质建构之间的关系。这都给我们强烈的暗示,雷蒙德的渴望十分有可能会成为灾难的起源。有一部当代作品几乎是《脚下泥巴》的衍生物,即2021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提名、金球奖最佳剧情片的《犬之力》。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所扮演的牧场主菲尔·伯班克和雷蒙德的心灵布置如出一辙,他们对男性气质歇斯底里的追求和对女性倾向的焦虑和恐惧(幼年乘坐旋转木马时,拒绝乘坐有着丰满臀部的木马,而选择黑色公牛),最终幻化成了女导演简·坎皮恩以柔克刚、解构有毒男性气质的叙事媒介。安妮·普鲁的处理则要柔和一些,她只是表达了这样的人已经过时了。

安妮·普鲁曾在采访中谈到过《犬之力》的作者托马斯·萨维奇,她说《断背山》刚发表时,托马斯·萨维奇给她打电话,告诉她自己写过一个类似的故事,不过当时,安妮·普鲁并不认识托马斯·萨维奇。读完《犬之力》之后,安妮·普鲁盛赞这本书写得非常精彩,可惜作家生不逢时,在1967年前后《犬之力》并没有能获得广泛的关注。安妮·普鲁甚至动情地说:“自从我在那通电话后得知了托马斯·萨维奇这个人,并且在几天后读了他的著作,我就有了一种维护它的冲动。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作家。”她其实是明白的,她猜测当时的文化环境,并不是以文学来解构代表着美国拓荒精神的牛仔形象的好时机。

《近距离》中还有一些作品很特别,它观念先行似地表达了作者的自然生态观,例如《身居地狱但求杯水》中,安妮·普鲁描述大地“危险而冷漠:大地固若金汤,尽管意外横祸的迹象随处可见,人命悲剧却不值一提。”我们曾谈到杜鲁门·卡波蒂的《冷血》,发生地是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农场主在经济萧条后生活渐有起色,却遭遇无妄之灾。安妮·普鲁笔下的故事,发生在相邻的得克萨斯,发生在气温零下三四十度的怀俄明州、发生在环绕怀俄明的蒙大拿州、内布拉斯加州、罗拉多州、爱达荷州。怀俄明的首府夏延,州名来自印第安语,其含义是“大草原”或“山与谷相间”,诞生了安妮·普鲁小说的基本场景。正如她在这篇小说中写的:“惟有泥土与天空最重要,惟有无止境重复倾泻泛滥的晨光。”



给生命以意义

□陆远

28岁那年,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受雇于维也纳一家精神病院,他经常这样询问那些遭遇巨大创伤与不幸的病人:“您为什么没有选择自杀?”这位刚从维也纳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试图从那些不忍放弃生命的种种理由中,寻觅若干虽纤弱却有韧性的情感细丝,编织出一张意义与责任的精神之网,为伤心人们重建坚强活下去的信念——这就是弗兰克提出的“意义疗法”的目标和挑战。

十年后,正是靠了这种“意义疗法”,弗兰克从炼狱中拯救了自己的生命。

那是1942年,弗兰克放弃了移民美国的签证,选择留在奥地利陪伴年迈的双亲和其他家人。不久,这个犹太家庭所有成员悉数被纳粹逮捕,旋即被押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在漫长的囚牢生涯中,弗兰克忍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身心凌虐。他的父母、妻子、兄长全部惨死狱中;而弗兰克本人除了一副眼镜和一架形销骨立的躯体外,也被剥夺了一切,甚至身体上的毛发都被全部剃光,随时面临死亡的召唤。不过,也正是在这个“除了寒伧可笑的一身之外别无余物可供丧失”的时刻,弗兰克体会到人类生命的独特意义:我们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集中营里的每一项刑罚也都是为了摧毁囚徒的一切而刻意设置的,但即便如此,刽子手们也无法夺走“人的最后一件自由”,那就是在任何既定境遇中选择个人生活态度的能力。正是靠着“自己选择生活态度”的顽强意志,弗兰克活了下来。

与此同时,弗兰克也在观察和帮助难友们。他想探知,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坚持下来?尤其是许多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囚徒,反而比那些健硕粗壮的人更能忍耐集中营里非人的折磨。弗兰克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前者拥有强大精神力量。即便身处恐怖环境,他们也能凭借丰富的内心世界,坚信生活中还有未完成的使命,正是这样的信念催生了克服绝望的能力,给人们以生存的勇气。

由此,弗兰克得出结论,即使在奥斯维辛这样的人间地狱,人们依然有选择的余地,他坚信“人有能力保留他精神自由以及心智的独立”。每个囚徒都面临着生死抉择:是因为看不到未来与希望,而“自甘沉沦”,逃避现实,放弃内在的自我而屈从于纳粹的暴行,进而放弃生的追求,还是在内心世界始终不放弃对探求生命意义的探求,从而继续与暴虐抗争。在这样极端的境遇面前,一个人能否在内心真正赋予生命以意义,对他能否超越当前的苦难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海明威说,人生来不是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可就是打不败他。面对无常的命运,他决绝地放弃生命,毫不妥协。而弗兰克却要求人们从绝境与死亡中寻求活着的意义,人类生命中最强劲的力量,也许就来源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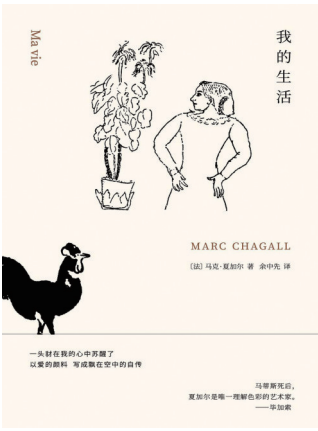
1945年4月,困居集中营两年多的弗兰克获得解救。翌年,他出版了《活出意义来》。在书中弗兰克强调,无论在何种恶劣的境地中,只要人能为自己的存在找到意义,就能积极健康地生活。至于如何寻求生命的意义,弗兰克提出三条不同的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坚持工作与创造。这是常规意义上的功名成就之路,也是最幸运之路。如果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恰与自己的性情与爱好相合,那就应当努力在工作中实现生命的价值。第二条路径是体认价值,也就是发现借由对诸如文化、爱情等等美好事物的体验,发现生命的意义。某些时候,个体的人生追求或与现实相悖,又不甘于生命沦于枯槁,便总要有所寄托,或寄情山水诗酒,或追求情爱长久,这种选择也许是出于无奈,却并非消极,而是把生命的意义引向时间的深处。

而弗兰克的超拔,更在于他所谓的第三条途径——借助于经受苦难,获得生命的意义,甚至苦难本身也具有独特的价值。难友们曾这样向弗兰克发问:“我们能在集中营里活下去吗?如果死亡必将到来,那么我们承受的所有痛苦又有什么意义?”弗兰克的回答是:“我们在绝境中不能选择生死,但可以选择面对它的态度。”

自出版以来,《活出意义来》就给无数读者带来鼓励和安慰,截至弗兰克去世的1997年,已在全世界发行将近1000万册。直到晚年,弗兰克依旧笔耕不辍,面对西方社会变迁的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和深化意义治疗理论。在他看来,20世纪后半叶人类面临的精神病症,突出表现为那种彻底的无意义感、无目标感、漂浮感和空虚感,如何为自己的生命找到意义与价值,依旧是富裕社会中人的使命与目标。

蒯人快语



早来的回忆

□蒯乐昊

作为一本回忆录,艺术大师马克·夏加尔的《我的生活》可真是写得太早了,这本书成于1922年,那一年,夏加尔才35岁,甚至有可能才33岁。关于夏加尔的年龄,历来存有争议,出生记录显示,他于1887年出生于白俄罗斯的犹太文化古城维捷布斯克。夏加尔曾说过,“我父亲明显有些偏爱我的大弟弟,在我的出生证上把我的年龄多填了两岁。”因此许多专家认为,他的真实出生年份应为1889年。但是,他在自传中写到的他出生时的那场火灾,应该发生在1887年。

虽然出生年份成为永久的悬念,但毋庸置疑,夏加尔在写作自己的自传时,依然是个年轻人,这份回忆也因此显得格外不同,它不是生命垂暮之年恬淡的喃喃自语,相反,它充满激情。战争、饥饿、绘画事业的起落和荒诞的政治斗争,都让这位年轻人感到困惑和愤怒。夏加尔活了九十六岁,见证了家乡经历的各个历史阶段:沙皇统治时期、一战、苏维埃时期,他也曾居留巴黎、柏林和纽约等地,并在世界各地短期旅行。十月革命爆发的时候,他在彼得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他在法国,为了躲避排犹风潮,他逃往南方,接着又逃到西班牙和葡萄牙,最后流亡美国。

《我的生活》只写了他生命前三分之一的内容,当时他已经举办了生平第一场个人画展,那也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时代风雨飘摇,一天晚上,夏加尔独自出门的时候,在市中心近距离目睹了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反犹的武装分子甚至把夏加尔团团围住,他连忙否认自己是犹太人,才得以在枪声中逃生。夏加尔的岳母家被反复抄家,只因为他们有钱。夏加尔在艺术学校教书,培养了几十名不错的画家,但最后被勒令二十四小时滚出学校。也是在写完这本书的同一年,夏加尔发现他八年前寄存在柏林画商瓦尔德那里的一百五十多幅绘画作品统统消失了。

夏加尔痛恨沙皇政府,因为他们对犹太人实行了压制性的政策;他对苏维埃政权也满腹狐疑,因为各级组织都对艺术漠不关心;他对画商心有余悸,因为他的许多作品都在他们手中莫名其妙地失踪了;他跟当时的许多艺术大师惺惺相惜,但又格格不入,时常感受到自己是一个陌异的多余之人。当他在回忆中写下“我渴望再次见到你们,B……,C……,P……,我累了。”的时候,没人知道这几个字母到底指的是他在欧洲的老朋友:“布拉克、桑德拉尔、毕加索”,还是他惦记的欧洲城市:“柏林、科隆、巴黎”。

“我写下这些字句,它们的意义如同一幅绘画。假如在我的绘画中有一个口袋,我兴许会把它全都塞在那里头……或者,它们可能会粘在我的一个人物的背上,或者,在我壁画上那个音乐家的裤子上?”夏加尔的语言风格颇似他的绘画:奇幻、漂浮、情绪化,以视觉构建叙事而非逻辑,现实退居其后,如梦境般的主观感受被置于前景。请体会这样的句子,当他写到的他出生时:

“首先跃入我眼帘中的,是一个澡盆。简简单单,四四方方,半凹陷,半椭圆。一个集市上常见的澡盆。一坐进去,我就把它全填满了。……但是,首先的一点是,我生下来就是死婴。我不想活。请想象一个不想活下去的白色小球。仿佛他腻烦透了夏加尔的绘画。他们用别针刺他,他们把他浸到水桶里。最终,他好不容易发出了一记轻微的哭叫声。从根本上说,我是一个死婴。”

为了让《我的生活》这本书更“夏加尔化”,他甚至专门去巴黎跟斯特拉克学习了蚀刻版画技艺,除了帮自己的回忆录制作插图,他还为果戈理的《死魂灵》和拉封丹的《寓言诗》乃至《圣经》设计了版画插图。

20世纪的艺术版图纷繁夺目,各种艺术流派走马灯似的轮番登场:后期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夏加尔在这些流派中独自穿行,却始终保留着自己的特色。在他眼里,所有的流派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包裹,原始艺术已经实现了技术的完美,而一茬一茬的现代人,玩弄着风格化,乐此不疲地钻入其中。夏加尔拒绝这样的游戏,在他三十出头不得不逃离祖国的时候,他已经在自传里预言了自己的成功。“欧洲会爱上我,跟它一起爱上我的,还有我的俄罗斯。”